

有功不居·受誣不辯

硬漢孔祥熙

(本文另有圖照刊四十二頁)

喬家才

共匪製造謠言攻勢

孔祥熙先生字庸之，民前三十二年（一八八〇）九月十一日出生於山西太谷縣程家莊，民國六十九年為庸之先生百歲誕辰，謹述其平生事功，以為紀念。

孔庸之先生主持國民政府財政，長達十二年之久。尤其對日抗戰時期，沿海及富庶地區盡失，對外交通中斷，全國各大都市相繼淪陷，稅收銳減，而軍費支出浩繁。在這樣惡劣情況之下，軍費不慮匱乏，支持八年之久，幾近奇蹟。他對國家的供獻，確實非比尋常。

共產黨想破壞政府，先摧毀政府的中流砥柱，於是惡毒宣傳，製造謠言，說孔祥熙是豪門，四大家族。誣戲不遺餘力，好些人受了虛偽宣傳的影響，對孔先生也發生誤解。

抗戰勝利，共產黨在馬歇爾主持的和談掩護之下，積極準備全面叛亂。他們破壞津浦、平漢兩條交通大動脈，使南北不能暢通，還有甚麼和平可談？他們破壞政府的威信，散佈謠言，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十二月共產黨陳伯達撰寫的「

中國四大家族」，由長江出版社印行，向國內外大量散發。把國家銀行的資產，都算在孔祥熙和宋子文名下，說他們在美國存款，有若干億美金。造成空氣，以阻止美國對國民政府援助，並且說這些資料得自美國國務院。

美國遠東問題專家兼中美文化協會主席柯爾勃致函孔宋兩人，徵求意見，可否由美國財政部公佈他們在美國銀行存款數字。孔先生非常贊成，於是柯爾勃函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諾蘭，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在參院外交委員會開會時提出，請國務院會同財政部詳細調查。調查結果，所有中國人在美國銀行的存款，連華僑在內，也沒有超過五千萬美元。最大的存戶，也祇有一百多萬元，而且是久居美國經商的華僑，並不是孔宋。

四十年（一九五二）三月紐約鏡報編輯布朗，為共產黨作宣傳，撰文說孔祥熙和宋子文在美國的私人財產多達八億五千萬美金。後來生活雜誌，公布了參議院有關的紀錄，孔祥熙覆柯爾勃的信，以及柯爾勃致美國各報館主筆的信，布朗的謊言才被揭穿。

又因為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後任國民政府財政

部部長，所以一般人喜歡將孔宋聯繫在一起，孔宋並稱。其實他們兩人格調各不相同。

接長財政部的困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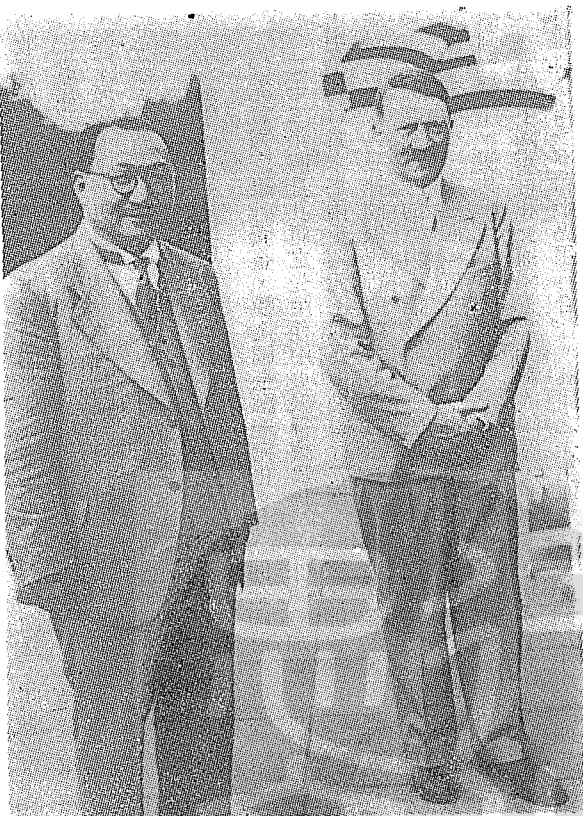
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對於財政並不高明，弄得國庫空空，軍費不繼，影響蔣委員長剿匪工作。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宋子文到歐洲出席經濟會議，行前告訴蔣委員長和行政院長汪兆銘，國庫僅存未發行的公債，可維持政府三個月開支，所以趁出國機會，洽借外債。

八月二十四日宋子文和美國簽定棉麥借款五千萬美元，八月二十九日宋子文返國，惹怒報人龔德柏，開始在救國日報大罵。他說我國棉麥價格，市價大跌，應該將棉麥輸出，穩定棉麥價格，保護農民不受損失。而宋子文身為財政部長，連這種情況都不明瞭，反其道而行，棉麥借款五千萬美元，也就是從美國輸入五千萬美元的棉麥，使棉麥市場更受壓迫。

龔德柏越罵越起勁，一連罵了兩個月，罵到十月二十九日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為止。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中美棉麥借款，由美金五千萬減

至兩千萬元，也許就是龔德柏罵的結果。當然宋子文垮台，並不是龔德柏罵垮的。他所以要堅決辭職，實在是對財政束手無策，再也幹不下去了。

這個時候的財政情況，每月支出兩千二百多萬，軍費一項即高達一千八百萬元，而每月收入不過一千五百多萬，不敷八百多萬。國庫僅存公債兩千七百萬元，即使全部順利發行，也祇能維持政府三個月開支，三個月以後，國民政府的財政將不堪收拾。聰明如宋子文，想到三個月以後的情景，不寒而慄，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幹了。這個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孔祥熙（左）訪晤德國元首希特勒（右）合影。

財政爛攤子，才由孔庸之先生接下來。

孔庸之先生理財之道，不同於過去的財政當局，他腳踏實地，按部就班。他的辦法是：「對現實，樹立信用，穩紮穩打，開源節流。」他對開源節流，也有原則。開源開之源，節應節之流。不唱高調，竭澤而漁，着重治本，培養稅源。他節流是節省不必要的浪費，不是百事俱廢，而是積極於建設，尤其對於交通建設，興建鐵路公路，不遺餘力，使行旅稱便，貨暢其流。

訂定六大理財原則

他定出六項整理財政的原則：

政的原則：

一：國防民生兼顧原則——他認為政府的責任，在為人民謀福利，故財政政策應以保障民生為首要。但為保障民生，必先謀國家的安全。所以國防和民生，必須兼顧。

二：培養財源原則——國家財稅既取之於民，就必須先使國民經濟充足盈餘，而後國用才不虞匱乏。於是從振興實業，充實經濟，活潑金融，繁榮社會着手。使生產增加，商貨暢

通，交易旺盛，再配合整頓稅收，國家財源自然就充裕了。

三、平均負擔原則——我們以三民主義建國，民生主義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可以借財政手段，達到社會公平分配的目的。於是推行土地呈報，舉辦直接稅，採取累進稅率。根據平均負擔原則，次第實施。

四：制度化原則——過去國家財政，收支一團糟，缺乏正確的預算制度，就是有一部份造具預算，內容也是空泛不合實際。執行機關視預算為具文，不按照預算分配使用。這種弊病不除去，國家財政永遠不會走上軌道。所以孔庸之任財政部長之始，首先確立預算制度，奠定主計制度，建立公庫制度，統一貨幣制度。一切都要制度化，軍政單位不論大小，都要以制度為軌範；國家收支不論多少，都須依照法定程序，不准稍有凌越。

五：生產原則——財政部要節流，是指不必要的開支，對於國家經濟建設，則大量支援，促進國家生產事業投資，以開闢國家的財源。這是一項非常積極的工作，對於以後財政幫助很大。

六：量入為出原則——量入為出，配合開源節流，這兩個原則實在是使國家財政走上軌道的最有力量手段。祇要把這個原則，切實去做，沒有不成功。

孔庸之先生把握這六項原則，國庫收入，逐有增加，二十三年收入是八億元，二十四年是九億元，二十五年增加到十億元以上，國庫充實，再不像宋子文時代，國庫空空，借債度日。

他不但使我國的財政完成現代國家的規範，

而且掃除各省金融上的割據局面，完成國家財政的統一；蠲免各項苛捐雜稅，多達七千多種，田賦附加三百多種，奠定民生基礎；釐定中央和地方收支的系統，以促進地方自治的發展。

孔庸之先生自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除了充實國庫，使國家財政走上正軌，還有幾大革興，關係更爲重要。

統一金融改革稅制

(一)充實國家銀行資金，使全國金融一元化。二十二年四月孔庸之先生任中央銀行總裁時，中央銀行資本爲兩千萬。他要中央銀行成爲金融總樞紐，發揮國家銀行的效力，就必須使中央銀行有控制金融的實力，能够領導一般銀行。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五月，增加中央銀行資金到一億元，使其庫存準備充足。

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都是私人銀行，它們唯利是圖，不和中央銀行合作。孔庸之先生要國家掌握運用這兩個銀行，於二十四年三月，增加中國銀行官股兩千萬，成爲資金四千萬元；增加交通銀行官股八百萬元，使其資金成爲兩千萬。這一措施受到很大阻力，當提出中央政治會議時，行政院長汪兆銘，秘書長唐有壬堅決反對，汪兆銘並且跑到青島，以表示不滿，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家璈也憤而辭職。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幸蔣委員長堅強支持，才衝破阻礙。蔣委員長爲此會電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滄：「國家社會皆瀕破產，致其結痂，乃在金融幣制之發行不能統

一。其中關鍵全在中交兩行固執其歷來吸吮國脈民膏反時代之傳統政策，而置國家社會於不顧。若不斷然矯正，則革命絕望，而革命亦被中交兩行所斷送，此事較軍閥割據，破壞革命爲尤甚也。……」可見其嚴重如何耳。

(二)廢除苛捐雜稅，以蘇民困。

國民革命軍未統一中國以前，各地軍閥形成割據局面，壓榨人民，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孔庸之先生接長財政部以後，於二十三年五月，召開全國財政會議於南京，廣邀各省市財政廳局長來京參加，並特聘財經專家出席，共一百三十八人，開會七天。主要的就是減輕田賦附加和廢除苛捐雜稅，改良稅制。

議案通過後，即明令各省，永遠不准再增加田賦附加，永遠不准再增加不合法稅捐。因此地方上經費不足，由中央撥款補助。當時國庫奇窮，此項負擔繁重，孔庸之先生堅決行之。自二十三年到二十六年年間裁撤苛雜七千一百多種，每年達六千七百餘萬元。減輕田賦附加三百多種，每年達三千八百萬元，整頓財政的毅力和氣魄，值得大書特書。

這一項財政上的統一措施，在政治上也收到統一的實效，功不可沒。

(三)徵收白銀出口稅，挽救金融恐慌。

我國是以白銀爲貨幣準備金的國家，但並不大產出產白銀，若讓白銀無限制的外流，對我國的金融太危險了。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美國宣佈白銀國有，無限制購買白銀，國際銀價大漲，中國白銀向美國輸售，可獲大利。外國銀行，大

做白銀買賣生意，我國無法阻止。於是財政部公佈了增徵白銀出口稅平衡稅的辦法，限制白銀出口，才堵塞這種漏洞，以穩定金融。

但是日本浪人在軍閥們鼓勵之下，在我國沿海，在華北鐵路沿線，依然幹白銀走私買賣，無法無天。孔庸之先生曾說服日本駐華武官磯谷廉介和喜多誠一兩少將，阻止破壞中國的金銀，幾經說服，收到實效，誠非易事。白銀出口問題解決，實爲實施改革貨幣政策的基礎。

法幣政策成功之基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實施法幣政策，不僅是財政上、貨幣改革上的創舉，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空前大事。沒有二十四年法幣政策實施，穩定幣制，二十六年對日抗戰，就無法支持下去。所以當時日本政府聽到這項政策的實施，非常震驚。

實施法幣政策，一般傳說是英國經濟代表團李滋羅斯建議的。其實孔庸之先生邀請英國經濟代表團來中國，目的在藉這個代表團的力量，改善英國銀行做白銀買賣，破壞我國金融。中國實施法幣政策，是根據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的理論，孔庸之先生早就成竹在胸。孫中山先生說：「用硬幣制度，受金融供給之限制，不能自由伸縮，以適應社會經濟之需要。其弊害在於無以靈活金融之運用，而且容易造成經濟恐慌。幣值不能安定，財政困難無由解決。故實施一種管理紙幣政策，此種政策近年來各國行之，均收宏效。且在戰時之主要性，尤屬顯而易見。」

實施法幣政策，爲了減少阻力，嚴密迅速。十一月三日財政部布告：施行法幣政策緊急辦法六條，自四日起，不得行使現金。

(一)自本(民國二十四年)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爲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爲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處治。

(二)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外，曾經財政部核准發行之銀行鈔票，准其暫時流通。其發行數額，即以截至十一月三日止流通之總額爲限。不得增發。由財政部酌定期限，逐漸以中央鈔票換回。並將流通總額之法定準備金，連同已印未發之鈔票，及已收回之舊鈔，悉數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保管。其核准印製中之新鈔，併俟印就時，一併照交保管。

(三)法幣準備金之保管及其發行收換事宜，設立法行準備管理委員會辦理，以昭確實，而固信用。其委員會章程，另案公佈。

(四)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發現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除銀本位幣按照面額對換法幣外，其餘銀類，各依其實含純銀數量兌換。

(五)舊有以銀幣單位訂立之契約，應各照原定數額，於到期日，概以法幣結算收付之。

(六)爲使法幣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

外匯。

我國係行使硬幣很久的國家，一旦改用法幣，人民心理上習慣上都有問題。所以將庫存白銀分別儲存於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以爲法幣的十足準備金，以昭大信。所以當時有些財政專家主張，既然實行法幣制度，不需要白銀作準備，應當集中到一個地方。而孔先生力排衆議，堅持十足準備。我們可以斷言，法幣政策順利推行，十足準備政策非常重要，使老百姓相信政府，政策實施，才會減少阻礙。

英國經濟專家甘納(E. Kana)於四十三年(一九五四)發表「一九三五年中國改革幣制之回溯」：

「關於中國改革幣制方案，過去以及現在，仍有若干人認爲係李滋羅斯之傑作。茲爲保持記載之正確，符合事實，以及糾正誤傳，本人深願指出，此項完善之改革幣制方案，並非出自李滋羅斯之手。改革幣制之方案，係由中國官方人士草擬妥善，而後實施者。僅在實施之前，將此草案交李滋羅斯閱及，請其提供意見而已。李滋羅斯閱及此草案後，非常贊成，並認爲是一項周密完整之計劃。關於此點，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離華前夕，曾在上海中英文各報發表書面聲明，也證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之改革幣制方案，彼並非起草人。

「他說：『本人首先重視者，爲貨幣之地位。中國使用銀元(實爲白銀)，已數世紀，因一三四年銀價之突然上漲，使中國貨幣兌換率，亦因此上升，中國之出產品價格，亦感昂貴，出口

貨銳減，必須輸出白銀，爲貿易上平衡之支付。

因此，造成銀根吃緊，及通貨收縮之危機。物價開始跌落，債務不能償還，銀行資金凍結，尤以上海房地產繁榮之崩潰，爲最嚴重。……當余九月間抵滬時，中國政府已在籌劃進一步之辦法，即廢銀元政策。中國政府決定以其本身之資源，制定一不兌換之管理貨幣。余對此大膽步驟，毫無責任。但可斷言，此舉則屬完全正當，且係成功者。實施後在全國各地，毫無困難。國家銀行之鈔票，即代替銀元流通市面，兌換率價值，保值穩定，國庫存額，亦逐漸增加。因此促進出口繁榮，增加農業生產者之購買力。貿易不平衡，逐漸減低，國際間之支付，以及國家之收支，可由統計數字中判定，均已完全平衡。所有穩定幣制之基本經濟條件，亦已完全齊備。』

「依據上項之敘述，證實一九三五年之改革幣制方案，決非李滋羅斯所創定者。此方案係由中國財政官員所計劃者，彼等具有高深精明之遠見，循避重就輕之途徑，而制此一方案也。」

清理公債建立信用

中國在北洋政府統制時期，因軍閥割據，相互殺伐，發生直皖、直奉屢次戰爭，財政困難，以濫發公債，維持一時。發行公債是割肉補瘡，並不是爲了正當用途。公債收入多半用於內戰，對於國計民生，毫無關係。公債越發行越多，信用自然破產了。

除了舉行內債，又用鹽稅關稅做担保，以借外債，如五國借款、參戰借款、西原借款等。以

致關稅鹽稅經常控制在外國手中，使財政處處受債權國家約束、牽制，失去國家財政獨立，尤為可恥。

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統一中國，建立了國民政府。在這種政權遞嬗情況之下，國民政府不承認北洋政府一切公債，也是無奈何的事。但是國民政府顧及國家的信用，不能不承認這些債務，雖非立刻償還，却是一種很沉重的負擔。

國民政府的財政政策，既然為保持國家對內對外的信譽，承諾了這些龐大的債務，得到國內國外的好評。孔庸之先生接長財政部以後，更確



民國二十六年孔祥熙（中）與夫人宋藹齡女士（右）長女公子孔令儀在上海法租界西愛咸斯路寓所合影留念。

定了整理公債的原則。積極的，以後發行公債的用途，加以限制。用於建設方面需要，才准發行公債。這樣，公債本身有保證，事業可以賺錢，對於國庫也有幫助。消極的，對於過去所發行的各種內外公債的信用，予以鞏固，使國民政府在國際間的地位和全國老百姓的信仰，得以提高。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發行了甲乙丙丁戊五種「二十五年統一公債」十四億六千萬元，年息六厘，用以整理三十三種國內公債。原先這些公債，名目繁多，種類不一，償付手續，又很複雜。發行新公債後，得以統一。

經過整理後的國內公債，人民和政府都有好處。對於政府方面：

- 一、債券化零為整。
- 二、債期延長，利率減低，使國庫負責減輕。
- 三、騰出一部份債票及基金，另行運用，藉以辦理各項建設事業。

對於持券人方面：

- 一、基金鞏固，獲得更硬實的保障，使公債本身的信用提高。

二、票類劃一，

兌領本息較前便利。

三、債票市價上漲，利益增加。

孔庸之先生認為對外債信，更不能忽視。因為我國業已統一，國家需要建設，以繁榮經濟，處處需要外人投資。若信用掃地，外資就會裹足不前，扼殺外人投資。財政部根據這一項原則，訂出整理外債辦法。

先整理北洋政府所欠的外債，沒有確實担保的部份。這些外債，拖欠的本息已經很久，信用一落千丈，幾近呆賬。假如國民政府不整理這些外債，再希望國際間向中國建設方面投資，實不可能。

民國二十四年以前，財政部已經把這些小額沒有問題的外債，和各國磋商，免息清償。二十五年以後，又進一步對數目大而沒有問題的公債，也着手洽商，免息償還。這些公債包括「津浦鐵路原續借款」、「隴海鐵路借款」、「太平洋航業公司借款」、「大陸商業銀行借款」、「漢口造幣廠借款」等十多種，由財政部分別和債權國家磋商，以關稅、鹽稅尚未指定用途的一部份，作為基金，次第予以清償。

這種辦法，有幾種好處：一、免去債息，二、延長期限，三、減少償額。這些公債，在國際市場已無價值，現在逐漸恢復。

各債權國對於中國財政當局這樣負責，非常同情欽佩，都無異議，衷誠合作。因此，對日抗戰以後，需要向各國借款，都能順利完成。

戰時財政維護生產

戰時財政情況之惡劣，實非想像所能及。收入大量縮減，平時主要稅源為關稅、鹽稅、統稅。戰時關鹽兩稅全部損失，統稅收入，也大幅減少。而支出增多，遠非平時可比。但孔庸之先生不但支付浩繁軍費，從容不迫，即對教育文化方面之支出，也大力支持。

陳立夫先生敘郭榮生先生所著「孔祥熙先生年譜」：「孔先生一生以提倡教育、振興實業八字為志願，時時以此抱負告人。戰時教育之種種措施，需費極鉅，而在抗戰時財政收入減少，軍需浩繁，一般人或以教育文化較為不急之務。但當時孔院長兼財政部長同意余之見解，認為抗戰與建國應雙管齊下，教育青年乃為建國預備人才，與抗戰軍事同一重要。所以，孔先生對於教育部之遷移學校，增設學校，以及戰區青年之救濟，中等以上學生之資金，各種費用之總額，僅次於軍費。當時行政院及財政部主管單位多不贊同，而孔先生特准由國庫支給，使余在戰時教育行政能有所施展，全賴孔先生之慷慨支援。」

設非當時設立西南、西北聯大、西北工學院、蘭州師範學院及國立各中學，收容各省中等學校之教師及青年，以扼止投奔共產黨之「抗大」，挽救不少青年。同時也不因戰爭而使人才枯竭，庸之先生和立夫先生同為國家培養人才，同為抗戰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財政部於八月十五日公佈了「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七條。自十六日起，各銀行之活期存款及到期之定期存款每個存戶於每星期祇能提取全部存款的百分之五，且

不得超過一百五十元。金融才得穩定。又為防止鉅額存款轉存外國銀行，與外商銀行成立君子協定，不收新的法幣存款，不售賣外匯給投機商人，一般預購遠期外匯的人，頭寸缺乏，不得不把所存外匯脫手，祇好轉售中央銀行，結果，中央銀行收到四百多萬英鎊的外匯。

為了維護生產事業，靈活運用，成立了中交農四銀行聯合辦事處，於國內十二大城市設立分處。財政部又設立了農產、工礦、貿易三個調整委員會，三個委員會的基金六千萬。其作用在扶助生產，增加國內所需要的物資；促進外銷，以調整國際外匯收付。

貿易委員會主要任務，在促進土產生絲、羊毛、豬鬃、桐油、茶葉等外銷。最初因為沿海通商口岸被敵人侵佔，出口的物資全部滯銷，價格慘跌，幾乎無人問津，國家外匯收入，受到很大損失。貿易委員會成立，把正當出口商人的困難解決，使出口貨物，源源外銷。

稅務經過整頓，又舉辦專賣，國庫收入逐漸增加。在關稅方面，以促進必需品之輸入，獎勵外銷物資之出口為原則。具體而言：減免必需品進口關稅；進口稅一律改為從價徵收稅制；洋貨由陷區內運，或徵進口稅，或禁止運往後方；豁免統銷與結匯物品出口稅；豁免非民生必需品出口稅；舉辦戰時消費稅。

沿海產鹽區淪陷，故對後方食鹽增產，積極獎勵，年有增加。鹽稅的改進，由從量計徵，改為從價計徵，最後實行「食鹽專賣」。食鹽專賣的好處，是徵稅率可以依價格伸縮，使國庫不吃

虧，消除商人剝削。老百姓負擔並不增加，國庫的收入却增加了。

統稅諸如棉紗、麵粉、紙煙、茶、糖、竹、木、皮、毛、瓷器等經過整理，也由從量徵收改為從價徵收。都有進步。

此外和英美成立外匯平準基金，以管理外匯，銷除上海外匯市場的市。又先後向英美蘇俄借款，計美國五次借款六億兩千五百萬美元，英國兩次五百十八萬鎊，蘇俄三次兩億五千萬美元，也對支持抗戰是最重要的因素。

田賦徵實軍民足食

孔庸之先生主持中國財政，能夠支持抗戰八年之久，實得力於「實行法幣」和「田賦徵實」兩大政策。田賦徵實使軍糧民食落實，不慮匱乏；也避免奸商囤積居奇，使社會安定，民生有所保障，關係最大。

田賦是中國最古老的賦稅，幾千年來，國家財政都是依賴田賦。人民也以繳納田賦為當然的義務。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制定國家稅和地方政府辦法，把田賦劃歸省稅。二十三年召開第二次財政會議，規定土地陳報，廢除一切田賦附加。三十年（一九四一）六月十六日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決定戰時田賦暫由中央接管，改徵實物。七月一日，行政院訂「戰時田賦改徵實物通則」，並成立糧食部，以徐堪為部長，專司其事。

田賦徵實，至少有四種好處：

一、軍糧公糧，不再向市場購買，可以減少對糧價刺激，也不因糧價波動，使財政上增加負

担。

二、政府手中控制大量存糧，具有控制糧食市場的力量，使囤積居奇者無所憑藉，糧價自然穩定，其他各種物價也受到良好的影響，趨於穩定。

三、符合公平負擔原則，農民負擔並未增加，而國家財政，獲益很大。

四、田賦徵實的最大效用，在使前方軍糧，後方民食，供應無缺。且使接近敵人地區，免去糧食資敵的危險，對敵人打擊最大。

孔庸之先生執掌國民政府財政，支持對日抗戰，在時刻想顛覆政府的共產黨眼中，是最大的障礙。不倒孔祥熙，就動搖不了國民政府，達不到顛覆的目的。正好中央信託局運輸處長林士良貪污一案發生，成了攻擊的最好藉口，造成輿論，孔先生不能不提出辭職。他是三十三年十一月辭去財政部長職務的。

國庫充盈事證俱在

孔先生辭職時，國庫存有外匯九億多美元，黃金六百萬兩，共合美金多達十二億元。國庫盈實，為民國以來所未有，當時所發行的法幣，祇用三億美元，就可以全部收回。而先生辭職不到五年，竟因金融崩潰，導致大陸沉淪，人存政舉，豈非明證。

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八月十六日孔先生病逝美國紐約醫院。九月一日台北舉行追悼會，先總統 蔣公手撰「孔庸之先生事略」：「……稍後，復以中正自兼行政院長，先生仍任副院長並兼財政金融原職。其間總理庶政，竭慮殫精，舉凡救濟凋敝農村，徹底革除蠶金，收回關稅自主；以工商建設，培厚國家資源；以財政統一，奠

定國家基業。他如預算制度之確立，公庫制度之實施，直接稅制度之推行，農貨及合作制度之創建，田賦征實制度之興辦，凡百戰時行政措施，鉅細不遺，在艱彌勵，此皆為世人所共見者也。……尤以自民國二十年之後，內有共匪之叛亂，外受日本軍閥之侵略。當國家環境最為險惡，與軍民生計最感困窮之際，而先生臨危受命，卒能沉着籌維，屢使革命大業轉危為安，抗戰軍事轉敗為勝。舉其大者：其一、為統一全國幣制。其二、為統一各省財政。其三、為維護教育經費。其四、為充實軍隊餉糈。尤以依照當時所定之戰略方針與經濟政策，籌撥鐵路公路建設經費為第一。在日本軍閥向我大陸侵略之前，協同交通等部，將粵漢鐵路、浙贛鐵路、湘桂黔鐵路，以及隨海鐵路如期完成。……其對抗戰成敗關係之大，尤足稱道。……」

鐵血精忠傳

喬家才著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恭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二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會敵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圍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

(上圖)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喜峯口、古北口抗日戰役後孔祥熙(左)與宋哲元(右)在河北遵化縣合影。



(下圖) 右起：何應欽、孔祥熙、閻錫山、白崇禧、徐永昌合影。

(文見第十頁)

